

Fu-Lai Yu, T. (2002, March). The economics of Frank H. Knight: an Austrian interpretation. In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Vol. 31, No. 2, pp. 1-23). Springer Netherlands.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弗兰克·H. 奈特的经济学：一种奥地利学派的诠释

余赴礼 (Tony Fu-Lai Yu) *

摘要 本文从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了弗兰克·H. 奈特的三大核心贡献：即经济方法论、人的行动理论、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精神。尽管奈特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但本文认为奈特的贡献在本质上是奥地利学派的。受威廉·詹姆斯、亨利·柏格森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奈特的主观主义经济学可以看作是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史上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之间的纽带。本文进一步表明，奈特可能更适合被放在奥地利-德国学派，因为“奥地利学派”一词过于狭窄，以至于无法涵盖德国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奈特的遗产留下了很多值得被一般而言的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和特别而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赞赏的东西。

引言：奈特，一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弗兰克·奈特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¹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又是对立的。弗兰克·奈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都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政府的批评者、市场经济的发展者，以及理性话语（作为探寻观察到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种手段）的信徒。²然而，两个学派的成员经常因为他们的理论信念而（至少在私底下）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头脑糊涂，甚至有悖于理性。具体来说，奈特严厉批评了哈耶克的资本理论。³而且，这两个学派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⁴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支柱之一。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即使不是支配着全世界，也支配着美国学术界。奈特的贡献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基础。⁵特别是，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被普遍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核心的经典陈述。⁶根据 Buchanan (425)，在芝加哥学派学者中广为流传的奈特专著

* 作者感谢 Dian Kwan 对本文的校对。

¹ 参见 Emmett, 2001a; Brouwer, 13.

² McKenzie, 1. 由 F. Hayek 为促进自由而创立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由大量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组成，例如 Wilhelm Ropke, 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James Buchanan 和 Gary Becker 等等。

³ 根据 Buchanan (425)的说法，在奈特的早期理论著作中，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但后来他坚决拒绝了这一理论。

⁴ 对有关差异的说明，请参见 Paugé (412-434).

⁵ Buchanan; Emmett (1999); Brouwer.

⁶ Emmett (1999), 30. George Stigler 认为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对价值理论的简明重述……满是对现有文献的发展”。（引自 Emmett, 1999, 30）。在 Ross Emmett (2001)编辑的《论芝加哥学派传统》（*On the Chicago Tradition, 1892-1945*）八卷本中，第七卷由奈特的七篇文章组成。有趣的

《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1951）包含了有助于为芝加哥学派确立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卓越地位的理论要素。⁷此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圣经。然而，奥地利学派是对新古典学派最严厉的批判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反驳奥地利学派的挑战，轻蔑地评论说，“……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⁸尽管奈特对芝加哥学派有影响，但本文认为，弗兰克·奈特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他的贡献，尤其是经济方法论、能动性、企业家精神和经济组织理论，留下了很多值得被一般而言的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和特别而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赞赏的东西。

本文的目的是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弗兰克·奈特的主要贡献。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⁹本文组织如下。在简要介绍了奈特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互动之后，将讨论他的方法论、能动性理论以及企业家精神和经济组织理论。本文的结论是，在主观主义的范式中，奈特的工作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扩展。

奈特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

奈特非常熟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他对奥地利学派著作的评论褒贬不一。奈特为卡尔·门格尔 1950 出版的《原理》（*Grundsätze*）的英文翻译（*Principles of Economics*）写了一篇批判性的序言。¹⁰ 20 世纪 30 年代，奈特对哈耶克的资本理论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关于交互主观性

（intersubjectivity），奈特认为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立场本质上是正确的。¹¹奈特认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现代奥地利主义的铅垂线”，是“……伟大的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最后一位。”¹²对于米塞斯的《人的行动》英文版的出版，奈特评论道，“……毫无疑问，所有学派的经济理论家和学者都会认为，以妥善的英文版呈现这本书对经济学来说是一项真正的工作。”¹³将奈特对奥地利学派著作的评论与其他非奥地利学派著作进行比较，¹⁴可以公平地说，奈特总体上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和许多奥地利学派的立场。

是，这些文章都没有摘自他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更具体地说，没有一个与他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理论有关。相反，包括了奈特关于成本和效用的论点。毫不奇怪，这是因为《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从来都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正如我要论证的那样，这本书本质上是奥地利学派的。

⁷ 《经济组织》在 20 世纪 30 年代芝加哥大学本科生的社会科学综合入门课程中被采纳为教材。通过这本书接触经济学的学生中有保罗·萨缪尔森，他在自己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的开篇中使用了奈特的框架。（Emmett, 2001a）

⁸ McKenzie, 1.

⁹ 参见 Langlois and Cosgel; Foss; 和 Gunning (1993, 1997)。

¹⁰ Kirzner (1979,54)认为奈特的序言是非常无情的。

¹¹ Knight, 1956, 163. 另见 McKinney, 1441.

¹² Herbert, 269.

¹³ 引自 Herbender。

¹⁴ 奈特的作品可以看成是系列评论。一般来说，奈特的评论很少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奈特的著作被一些主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广泛引用，例如，仅举几例，Mises (1949/1966), Lachmann (1977, 1994), Rothbard (1962/1993), Kirzner (1960, 1973, 1979) 和 O’ Driscoll and Rizzo。¹⁵拉赫曼写了一篇关于奈特的《自由与改革》（*Freedom and Reform*）的评论。正如将要讨论的那样，许多奈特式的见解影响并强化了哈耶克、米塞斯、拉赫曼、柯兹纳和其他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能忽视奈特的作品。

奈特与奥地利学派思想相关的贡献可以在三个主要主题下进行讨论，即：经济方法论、人的行动理论、不确定性和企业家判断的作用。¹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特对这些主题的贡献随后在当代芝加哥学派范式中遗失了，但在现代奥地利学派中十分活跃，并散布在新制度主义者（如 Langlois 和 Cosgel，以及 Foss）的作品中。

奈特的方法论

奈特的经济方法论与他的芝加哥学派同行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奈特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解（*Verstehen*）方法论立场的热心支持者，非常赞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观点。¹⁷今天的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灵感并非来自弗兰克·奈特，而是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这种被取代的奈特传统（强调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的人的行动）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的学生和同事身上得到了体现。¹⁸

在哲学方面，奈特和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着相似的理由。奈特的思想要归功于主观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¹⁹当今的奥地利学派作品显示出了一种趋势，即采纳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社会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和亨利·柏格森。²⁰关于柏格森，Mises (1949/1966, 33) 评论说：“……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家比柏格森更普遍地熟悉当代知识的各个分支。”如下文所述，经历（或柏格森时间）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精髓。

德国的影响：韦伯的遗产 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维塞尔、米塞斯和拉赫曼）深受社会科学巨人马克斯·韦伯的影响。²¹奈特对韦伯的钦佩是众所周知的。奈特曾经说过：“如果我要重新开始，我会以他的【韦伯的】思想

¹⁵ 例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的《人的行动》中四次引用了 Knight (66, 292, 492, 848)。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人，经济与国家》中引用了 Knight (1921)，广泛地论述了资本理论、时间偏好、利润理论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

¹⁶ 没有将奈特的企业理论纳入本文的部分原因是奥地利学派没有企业理论，尽管他们对制度的演进有深刻的看法。

¹⁷ Lavoie, 14.

¹⁸ Boettke, 1987, 7.

¹⁹ McKinney, 1438-1439; Foss, 79.

²⁰ O’Driscoll and Rizzo.

²¹ 韦伯对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部分地使我得出结论，奥地利学派更适合被称为奥地利-德国学派。参见本文的结论。

为基础。”²²在对奈特的《自由与改革》的评论中，Lachmann (1947, 317)评论道：“自始至终都能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他【奈特】的影响。”奈特翻译了韦伯的《一般经济史》（*General Economy History*），并且是第一位承认韦伯的著作是比较经济史基础的美国经济学家。²³同样，韦伯对奥地利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维塞尔在韦伯的总编辑下出版了他的《社会经济学》。米塞斯采用了韦伯的方法论。Lachmann (1951, 95)在评论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时指出，“……这里继续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工作。”拉赫曼的《马克斯·韦伯的遗产》（*The Legacy of Max Weber*）探索了人的计划的概念，并展示了韦伯和米塞斯的研究计划之间的联系。²⁴受韦伯的影响，奈特的工作与奥地利学派的同行一样，都可以放在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领域。他们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世界背景下审视人的行动。

社会世界中的人的需要 奈特认为，人的需要的新古典功利主义表述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在他看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涉及一个致命的混淆，即在理解社会关系时贯彻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精神。对于 Knight (1921, xii) 来说，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就连吃饭本身也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兴趣。为了身体舒适，人们确实需要营养和某些要求，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取决于历史形成的社会标准。Knight (1921, xiii-xiv)指出：

……在需要中，一种更大的元素是审美。审美吸引力在何种程度上以某种普遍的方式取决于内在品质，它与一种文化的稳定特征有多大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时尚或社会-历史偶然性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与需要中的审美元素在很大程度上重叠的是纯粹的“社会”需要，它仅以特定的经济财货为象征，就像在竞技中获胜的欲望以得分为中心。社会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类两极分化的形式，如一致与差别、自由与权力，但在分析中却从未得到明确的分离。

在奈特看来（1921, xxxiv），人的兴趣不是纯粹经济的。人类，“……就社会-心理事实而言，都希望在某种社会中成为某种人”（粗体为后加）。这种观点意味着经济学中的相关性取决于它与制度历史基础的整体联系。²⁵然而，就像他的奥地利学派同行一样，奈特从来都不是制度主义者。他与制度主义决裂，因为他认为制度主义侧重于有意设计的制度，而不是自发的制度或自然的制度。奈特的方法论立场最好定位于社会经济学领域。²⁶当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如拉沃伊，Koppl (1994; 1997)和余赴礼；以及现象学社会学家，如阿尔弗雷德·舒茨、彼得·L. 伯杰（Peter L. Berger）、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和大卫·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也采用了这一韦伯式传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Knight (1921, 52ff) 阐述了他的社会现实原则。Knight (1947, 21) 声称人的行动是前社会的（pre-social），由随后的社会化产

²² 引自 Schweitzer, 279.

²³ Schweitzer, 280.

²⁴ Boettke, 1994, 230.

²⁵ Knight 1921, xxviii.

²⁶ 参见 Schweitzer 对奈特的《社会经济学》的讨论。

生。换言之，行动是嵌入社会并由传记决定的。²⁷在他后来的作品中，Knight (1947, 69-70) 认为：

个体是给定的基据。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和由社会过程形成的，并且个体的本质必须受到社会行动的影响。个体在有资格成为一个由负责单位组成的组织的成员之前，一贫如洗、无助地来到这个世界。因此，先于个人的是家庭。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的某些家庭生活，和远不止于此的某种更广泛的初级群体和文化群体生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作为数据——被视为一个社会。

这一论点就是伯杰和勒克曼所说的“现实的社会建构”。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社会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这一论点，即人的需要是社会建构，导致奈特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被当做自然科学来对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强烈持有的这一观点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验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比。Knight (1921, xv) 将经济理论视为一种社会理论，并认为“……对任何社会理论都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不科学的描述。”对于 Knight (1956, 155-156)：

在实证自然科学或数学的概括意义上既不是观察到的，也不是从观察中推断出来的，但它们在真正意义上并不是任意的。他们陈述“事实”，关于“现实”的真理——关于心理现实的分析真理，因此是部分真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处理不同类别的知识和真理与自然科学的真理不同，真理与感官观察有关，最终甚至与逻辑有关，其方式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所获得的真理截然不同。但它仍然是关于现实的知识。

在奈特的观点 (1921, xvi-xvii) 中，社会科学意味着承认处理“真正的社会价值”。如果没有政治和道德，经济学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认识到动机、社会象征和伦理方面的其他因素，将使研究在人的意义上更加现实和真实，而在自然客观科学的意义上则不那么科学。

方法论解释主义 奈特拒绝新古典实证主义，指出经济学需要将自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解释性研究。²⁸ Koppl (1994, 290) 评论说：

从一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就具有形式化和解释性的元素。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作者是强调使用数学的形式主义者。门格尔和奈特采取了一种更解释性的方法，总是将现象追溯到产生它们思想和行动。

Knight (1921, 209) 认为，由逻辑学家制定的知识理论主要是一种精确知识的理论，一种严格论证的理论。就柏格森意义上的变化而言，在精确知识的理论中采用的那种推理是不可能的。奈特建议通过维塞尔所采用的方法来了解世

²⁷ 参见 Granovetter; Schultz; 以及 Berger and Berger.

²⁸ Madison, 1994, 38-39.

界。在《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中，Wieser (3-4)介绍了他的方法论：

科学地穷尽日常经济经验的内容并加以解释，是经济理论的问题。所有人都熟悉一个狭窄的、实际的领域。从这些有限的观点，理论推导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解释，使我们能够理解经济的意义，即使在那些远远超越个人经验的广泛社会关系中……我们的理论在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意识中发现丰富的经验，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这些是每个科学家都与外行分享的经验，无需借助特殊的科学仪器。它们是关于外部世界事实的经验，……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源泉和潮流的经验。

在奈特（1947, 273）看来，主观数据的知识必须通过公开的行为，特别是通过相互交流获得，问题就成了主要是解释的问题。奈特在他著名的文章《经济学中的真理是什么》（1940/1956, 177）中攻击了 T.W. 哈钦森（T.W. Hutchison）的实证主义，他写道：

对经济科学或政策领域问题的具体而积极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价值和程序的判断，基于文化意义上的广泛的通识教育，以及对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洞察”，而不是任何可能的实证科学的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进行解释性研究（*verstehende Wissenschaft*），然而，它需要远远超出经济学的任何可能界限，应该包括人文学科以及整个社会学科领域。

换句话说，奈特呼吁理解，这是韦伯传统中的一种方法，被米塞斯、哈耶克、拉赫曼等年轻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普遍采用。特别是，Prychitko (303-319) 认为，奈特对“解释性研究”的点头示意预见拉赫曼。一些当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纳入了现象学。²⁹ Knight (1935/1951, 125) 称赞了维塞尔，认为感觉、意义和有意行动的整体构成了常识领域。对奈特来说，经济理解不是来自观察，而是来自直觉。要理解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远离科学，训练我们的直觉力。在奈特看来，人类行动不是基于事实和现实本身，而是基于关于事实的观点和信念，这构成了人的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始于对自己和他人的意义和理解。这种观点非常接近韦伯的意义，即行动者自己所看到的行动。因此，科学中客观观察到的外部情况被关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主观已知意义和知识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从情境到意义的转变，Knight (1935/1951, 134) 说：“……人们更关心意义而不是感官特性。”对奈特来说，社会互动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信息，可供许多行动者使用。此外，还有某些价值观，应该是我们认为对我们的行动具有约束力的东西。有了信息和价值观，行动因此采取选择的形式，因为我们可以接受和拒绝各种替代方案。³⁰

先验主义推理 大多数米塞斯主义的追随者都会同意，人的行为的公理是普遍正确的、不言而喻的，因此是不可挑战的。Mises (1949/1966, 30-71) 认为，人的行动科学的陈述和命题并非源自经验。就像逻辑和数学一样，它们是先验的。作

²⁹ 例如，参见 Lachman, 1970; Lavoie; Koppl, 1994; 以及 Yu.

³⁰ Schweitzer, 286.

为康德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Mises (1949/1966, 34)断言，行动的概念先验于所有经验，因为它是“……人的心智逻辑结构的本质和必要的特征。”对于Mises (1949/1966, 18)，人的行动是先验真理；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预设，一个终极给定（ultimate given）。它是这一说法（即人的行动不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它不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设——而是在经验之前就已经知道，它是一种意识现象）背后的真理。因此，人的行动“……不能被追溯回它的原因。它必须被认为是一个终极给定，并且必须被这样研究。”³¹换句话说，人的行动是终极给定的。Rothbard (1976, 21)，采用米塞斯的立场，即我们“……从一个正确的公理推论出的正确结论。这些结论无法用历史或统计方法‘检验’，况且也没有必要检验它们，因为它们的真实性已经被确立。”

米塞斯的方法论被一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例如布劳格）认为是“古怪而独特的”。然而，奈特是少数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持有先验观点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先验命题的论证远没有通常呈现的那么神秘。Knight (1956, 160) 认为：

……要记录的第一个事实是，这个现实领域存在或者“在那里”。这个事实不能被证明或争论或“测试”。如果有人否认人有兴趣，或者“我们”对其有相当多的有效知识，那么经济学及其全部著作对这样的人来说就如同色彩世界对盲人一样。但是仍然会有一个区别：一个身体上、视觉上瞎掉的人可能仍然被评为正常的智力和正常的头脑。

Knight (1956, 163) 进一步阐述道：

……从内部观察必须根据已经坚持的所有思想的社会心理和相互交流特征来解释。显然，与任何自然知识相比，甚至与通常被视为逻辑公理或一般性的最高抽象相比，基于这种“观察”的知识在特殊意义上是直觉的有效思维的形式。用任何“经验程序”去“验证”任何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都是不可能的。

他（1956, 168）总结道：“……经济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实体演绎’科学，类似于几何学或数学力学；但此外，在比数学本身更高或更纯粹的意义，它的数据是直觉的。”

人的能动性理论

奈特被认为是现代人的能动性理论的先驱。³²奈特关于人的能动性的观点与奥地利学派惊人地相似。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从这样一个模型开始，“……人的心智或一个虚构的意识，被赋予了某些目标、约束、知识和期望。”³³利用 Weber (87-118)提出的人的行动理论，Mises (1949/1966)提出了一种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称为行动学（praxeology），它基于个人行动的基本公理。换句话

³¹ Mises, 1949/1966, 18.

³² Gunning, 1993.

³³ O'Driscoll and Rizzo, 20.

说，个人为了所选的目标而有意识地采取行动。Rothbard (1962/1993, 1-17)详细阐述了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理论如下：

1.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与无意识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无意识行为是身体细胞和神经对刺激的反射和非自愿反应。
2. 主体为了所选的目标而有意识地采取行动。行动者选择、决定并试图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标，必须使用手段。主体有意识地选择了某些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3. 主体相信他们采用了技术上正确的方法来达到目标。人的行动方法不假设主体对价值观或目标的选择是明智的、适当的或正确的。它所宣称的是，鉴于他们的知识，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法。
4. 所有的行动都必须通过时间发生。换句话说，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当下，并指向一个目的的未来达成。这意味着主体并不拥有对未来的无所不知的知识。

奈特预见了一种奥地利学派的人的能动性理论，他描绘了一个涉及意识、前瞻性和部分知识的人类思维——这些元素通常是奥地利学派的。

意识：有目的的人的行动 奈特思想的中心是个体的心智，它涉及“……思考、决定和解决问题。”³⁴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以一种与任何其他有机物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思想的基础上思考和行动。³⁵ Knight (1921, 200-202)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意识地有目的的个体的联合，”³⁶主张：

……研究知识和行为的第一个基据是意识本身这一事实。意识的作用是为有机体提供未来的“知识”……。因此，有意识行为的普遍形式是旨在改变从当前情况推断出的未来情况的行动。

这个论点就是米塞斯的有目的的人的行動的概念。此外，对于 Knight (1921, 202-203) 来说，意识的功能是推断，所有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断的；理性的。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动性总是推断出没有他们的推断的未来情况会怎样，以及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而，人的能动性可能会以不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Knight (1956, 128)清楚地指出，“……认为它总是被正确解决，就等于否认这是一个问题，否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³⁷

向前看的视角 奥地利学派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强调时间的作用及其向前看的视角。奈特强烈持有这种观点。正如 Knight (1921, 200-201)所论证的，人的意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向前看的特征。有意识的生活和无意识的生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预见未来”。它会在情况发生之前对情况作出反应。有机体使自己适应环境的重新调整需要时间。有机体“看”得越远，它就越能更

³⁴ Knight, 1947, 206. 另见 McKinney, 1438.

³⁵ Knight, 1956, 123.

³⁶ Ibid, 124-125.

³⁷ 此外，Knight (1921, 200) 认为意识与“警觉”有关。因此，奈特的心理建构理论预示了 Kirzner (1973)的企业家精神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他们对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机会保持警觉。

充分地适应自己，就越能更充分、更有能力地生活。就刺激和反应而言，重新调整过程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人们对未来事态的“形象”做出反应。这个形象既是现在的又是可操作的，适应是自发的和向前看的。

这种向前看的观点对奈特的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将视角应用到生产活动中，企业家对未来的期望是为了利润。利润或亏损源于这一事实，即企业家以固定费率提前签订生产性服务合同，并通过在制成产品的市场上销售产品来实现使用它们的利润或损失。在竞争中，生产者必须估计他们正在努力满足的未来需求，以及他们试图满足该需求的未来经营结果。³⁸正确的估计会产生利润。利润的不确定性理论——奈特的核心见解之一——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部分知识和学习 正如 Hayek (523)所说，所有经济问题都是由不确定性引起的知识问题。这种洞见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奈特关注体现在人的行动中的部分知识问题。他（1921, 199）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只有通过知道关于未来的某些东西才能生活；而生活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源于我们知之甚少这一事实……情况的本质是根据意见——具有或多或少的基础和价值，既不是完全的无知，也不是完全和完美的信息，而是部分知识——采取行动。（重点为原文）。

鉴于知识的限制，理性行为力求将手段用于目的所涉及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³⁹我们正在努力确保运用，这意味着尽可能完美的远见。在奈特看来，我们确实努力减少不确定性，即使我们不希望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⁴⁰为了减少不确定性，主体必须学习。因此，根据 Knight (1921, 243)的观点，知识是学习的问题。学习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处理的情况以及学习者都会发生变化。严格意义上来说，目的很少或从未真正给定；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针对其实现的活动过程中重新定义的。⁴¹在奈特看来 (1956, 162-163)：

……除了持续和发展的社会学习过程之外，知识和智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必然涉及学习者与其他自我的交流，包括大量比他自己了解（已经学到）更多的自我，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他们习惯性地相互交流的非我世界中并对其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知识和我们对彼此的知识以及对“心灵”的一般知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必须相互关联地进行研究。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³⁸ Knight, 1921, 238.

³⁹ *Id.*

⁴⁰ 同样，Mises (1949/1966) 认为，人总是渴望减少因不确定性而引起的不适之感。

⁴¹ Knight, 1921, 238.

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强调真正的或结构的不确定性。特别是，Mises (1949/1966, 105)以几乎与奈特类似的方式陈述：“如果人能知晓未来，他就无需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他将像一个机械的人那样，毫无自身意志地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它是一种导致协调问题的意外变化。奈特的利润和企业精神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基于不确定性概念的分析。对于 Knight (1947, 206) 来说，人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在他看来 (1921, 231)，商业决策处理的情况太独特了，以至于任何类型的统计表格都没有任何指导价值。在处理知识问题时，奈特区分了风险 (risk) 和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风险和不确定性 Knight (1921, 233)使用术语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来分别表示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风险或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奈特认为一组实例中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通过先验计算或过去经验的统计）。换言之，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出客观概率的特征，因此是可测量的，因此是可保的。对于 Knight (1921, 247)来说，保险处理的那些事件是可以被妥善分类的，或者是显示出相对较低的独特性的。对于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奈特意义上的真正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形成一组实例，因为所处理的情况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由于主观概率的本质，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保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以自然现象为例，考虑预测天气状况。利用气象台过去的记录，我们可以计算出某一天下雨的概率。根据奈特的说法，我们可以测量这个（客观的）概率。因此，这种不确定性是可保的。考虑另一种情况。假设一个人每天去邮局上班。他总是有可能在某一天生病，因此无法出现。利用他的病史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他在某一天出现的“客观概率”。尽管我们与主体打交道，但疾病是一种物理现象。因此，这种风险——由事件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是可保的，因为它涉及物理世界并且不受人的本质的影响。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具有主观的概率，并且是不可测量和不可保的？奈特的回答是，涉及人的行动的不确定性。使用邮局案例，假设该人对他的工作非常不满意。他想要改变。一天早上，他休了一天假，成为了海滩上的冰淇淋小贩。因此，此动作是唯一且不可重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录可以帮助计算他当天缺席的概率。行动带来惊喜。这本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奈特的不确定性，它是不可预测的人的行动的结果。显然，当一个人在特定工作日没有出现时，从整体上很难确定缺席是由于客观不确定性（由于物理现象）还是主观不确定性（由于人的创造性思维），因为两者与该人当天的缺席有关。通常，客观和主观的不确定性可能同时涉及。⁴²因此，Knight (1921,234) 得出结论：“……就客观概率进入计算而言，很难想象一个聪明的个体将任何单个案例视为绝对孤立的。”

奈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真实时间 (real time) 的概念进一步阐明。在柏格森的观点中，真正的不确定性特征是在事件流中既相对时间独立又与时间相关。根据 O'Driscoll and Rizzo (77)，我们可以识别出两种事件：典型的和独特的。典型的的活动是可重复的，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影响环境状态和个体交互的因素使得模式的提取成为可能。在第一类（环境）中，典型化的可能性

⁴² Knight, 1921, 238.

取决于牛顿世界的物理定律。在第二类（个人互动）中，经验法则和企业家协调的相互加强和稳定效应使典型模式成为可能。日常活动，例如遵循经验法则，使我们更接近连续体的牛顿端。根据经验，个人会执行某些行动，而不会看到日常活动如何融入整体情况。在观察者看来是一个连贯过程的每一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对孤立和支离破碎的。因此，记忆跨度进一步缩小，主观时间进一步减慢。⁴³换句话说，这些日常活动虽然起源于人的心智，但可以被视为自然现象。然后很容易预测日常活动，就好像没有人的行动一样。

事件的独特特征是不可重复的方面或一个稳定模式的特定时间相关变体。任何预测事件独特方面的尝试都会改变它们的位置值，至少因为预测本身现在必须影响最终的体验。对未来事件的独特特征的考虑强调了实时预期的基本开放性（open-endedness）。基于上述论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科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事件的典型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消除了未来的开放性。O'Driscoll and Rizzo (75) 正确地得出结论，奈特的可测量和不可测量不确定性的关键对比不在概率的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之间。⁴⁴而是在牛顿形式的不确定性和纯（真实）时间相关的不确定性之间。前者是静态的，而后者是内生创造的。奈特对不确定性的总体立场与他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一致的。

主体间不确定性 尽管人的行动者面临与物理性质相关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与人的互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但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尤其是米塞斯）都对后一类感兴趣。对于 Mises (1949/1966)来说，人的行动总是面向其他个体的。由他人的行动引起的不确定性会产生经济问题或协调问题。因此，主体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其他主体的行动。⁴⁵

奈特认为，来自自然的不确定性是可保的，不会导致经济问题。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人的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或主体间不确定性（Gunning, 1993 所使用的术语）。对于 Knight (1921, 201, 208, 228) 来说，决定性的是主体间不确定性。主体假设其他生物的行为方式与他们自己相同。我们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在经验的基础上，关于他们自己形成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是他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人们的确形成了或多或少有效的意见。

与奈特一样，Mises (1949/1966, 248) 指出，每个行动都存在主体间不确定性。市场经济中的行动者必然会经历主体间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无法准确预测其他人的行动。在存在主体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无法完全预测是由于：1) 人的心智的复杂性，2) 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的主观主义假设，以及 3) 大量不同的人。因此，Mises (1949/1966, 252)得出结论，市场经济中的所有行为都是投机性的。

主体间不确定性、企业家判断与利润 在奈特的观点（1921, 210-211, 278, 281, 289）中，企业家职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承担不确定性。未来的情况取决于

⁴³ O'Driscoll and Rizzo, 69.

⁴⁴ 参见 Savage.

⁴⁵ Langlois, 173.

大量因素——企业家们很少就这些因素进行数学研究。相反，他们使用直觉。Knight (1921, 211) 同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观点，即企业管理者受“训练有素的本能”而非知识的指导，认为企业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会使用判断、常识或直觉。对奈特来说，企业家主要根据他们对过去的整体经验进行“推断”，有点类似于在手上没有测量仪器时，我们如何处理本质上简单（无法分析）的问题，如估计距离、重量或其他物理量级。

Knight (1921, 210)认为，企业家是对自己的判断下注的人。生活中的普通决定是在粗略和肤浅的“估计”的基础上做出的。企业家试图确定雇用什么样的人，下达什么样的命令，利用哪些非人为因素，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员工。企业家还预测未来的需求状况，他们认识到这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行动。在做出决定和预测后，他们继续对替代行动的盈利能力做出判断。当他们最终决定雇用要素并生产用于最终出售的产品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押注他们对所使用要素价值的判断比其他不愿出价的人的判断更准确。这样，要素就被那些最相信和信任他们的判断的人控制和分配。⁴⁶

谁将从事企业家功能？Knight (1921, 244)认为，与不确定性相关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一种倾向，即在某些人和阶级的手中专门满足该功能。Knight (1921, 241-242)提出了个人属性和能力的五个可变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企业家判断的专业化：1) 在通过感知和推断，形成正确判断环境中事件的未来进程上的能力差异；2) 在判断手段、辨别和计划必要的步骤并调整以满足预期的未来情况上，主体的能力差异；3) 执行被认为是必要和可取的计划和调整的力量的变化；4) 由于个人对判断的信心程度不同，在涉及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行为的多样性，以及5) 对一种情况——人们以给定程度的信心对该情况作出判断——的意向态度的差异。⁴⁷简单来说，有些人是风险厌恶者，而有些人是冒险者。

估计或判断容易出错。因此，利润来自负责任的企业家的错误或不完美的远见。⁴⁸商业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在将人员分配到各自的职位和确定他们为填补职位应获得的报酬方面的估计能力。⁴⁹利润水平没有被规定在任何协议中，也没有被固定在交易中，而是取决于企业或事业的成功。

企业家精神对判断的纳入与米塞斯所阐述的企业家精神非常一致。⁵⁰ Mises (1949/1966, 291)以奈特式的语气认为：

……像每一个行动人一样，企业家毫无例外地是一个投机者。他处理的是未来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成败与否，取决于他预测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准确性。如果他对未来事件的理解有误，就必定马失前蹄。企业家利润的惟一来源是他比别人能更好地预测消费者未来的需求。如果每一

⁴⁶ Knight, 1921, 268.

⁴⁷ Knight (1921, 242) 认为，由于在行为情境中，有效的不确定性的量是对已完成行为正确适应未来的主观信心程度，所以这五个项目可以减少到两个：即主观的或感觉到的不确定性，以及行动者对它的意向感觉。

⁴⁸ Knight, 1921, 203,230; 1956, 24.

⁴⁹ Knight, 1921, 229.

⁵⁰ High, 1982, 165.

个人都能正确预测某一商品未来的市场状况，那么该商品的价格以及相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今天就能够得到适应性的调整。结果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将不赔不赚。⁵¹

Mises (1962, 109, 120) 认为，是企业家的决策导致了利润或损失。

使利润出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比其他人更准确地判断产品未来价格的企业家，以从市场未来状况的角度来看过低的价格购买部分或全部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错误判断产品未来价格的企业家，允许以从市场未来状况的角度来看过高的生产要素价格。

因此，Mises (1949/1966, 293) 得出结论：“企业家盈亏的最终来源是未来供需状况的不确定性。”

既然判断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判断出错的概率是多少？奈特回答说，无论是先验地计算这种概率，还是通过研究大量实例来凭经验确定它，都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商人不仅对他们的行动结果做出了他们所能做出的最佳估计，而且他们很可能估计这个估计正确的概率。对于 Knight (1921, 226, 229) 来说，在得出结论后所感受到的确定或信心程度不容忽视。这种形成正确判断的能力是使一个人在商业中有用的主要事实。人的主观自信感做出预测。人们有一种直觉或预感，一种情况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种感觉可能会因其力量和持久性而或多或少地激发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心。

Mises (1949/1966, 299) 以奈特式的口吻认为，企业家“……相信他自己对未来市场状况的理解能力要强于他那些没有天赋的同胞。”他能更正确地阅读市场数据。柯兹纳进一步认为，企业家对他们的洞察力充满信心，相信他们的预感。在 Kirzner (1998, 14-15) 中，他认为：

……真正的机会不需要勇气和领导力来承担风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企业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发现可用的、有吸引力的创新机会。如果企业家没有看到这个机会如此闪耀，以至于尽管其他人对它持怀疑态度，尽管它最终可能会失败，但它驱使他去实施它——那么企业家还没有真正“看到”那个机会。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争辩说，柯兹纳式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中的一种均衡力量，是奈特-米塞斯式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特例。⁵²

结论：作为奥地利-德国学派经济学家的弗兰克·奈特

自卡尔·门格尔创立奥地利学派以来，他的两个弟子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扩展了门格尔的贡献。维塞尔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门格尔的主观主义。不幸

⁵¹ 关于奈特和米塞斯之间的相似性，Herbert and Link (1982, 130) 评论说，“……在涉及企业家精神主题的几乎每一个基本点上，他（米塞斯）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位‘奈特主义者’。”

⁵² 参见 High (161-168)，以比较在奈特主义视角下，米塞斯和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理论。

的是，庞巴维克未能发展门格尔主义传统。⁵³哈耶克主要负责通过他在伦敦经济学派担任讲席教授的职位，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从欧洲大陆带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然而，正如 Gunning (1997, 172-191) 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门格尔作品中独特的主观主义方法不是由哈耶克开发的，尽管哈耶克确实强调了主观主义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为理论心理学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学上，哈耶克的贡献只能用新古典奥地利学派来形容。相反，门格尔的主观主义是由奈特发展的。⁵⁴直到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主观主义方法才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因此，在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历史中，奈特充当了门格尔和米塞斯之间缺失的一环。

本文表明，奈特预见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几个关键要素。在这方面，奈特应该被放在奥地利学派而不是芝加哥阵营。在经济学史上，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经常相互影响。如本文所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采纳了韦伯和奈特的许多贡献。奥地利学派中的“奥地利”一词越来越变得过于狭窄，以至于无法涵盖源自韦伯、熊彼特和奈特等德国学派学者的思想。鉴于此，奥地利学派应该更恰当地重新命名为奥地利-德国学派。

参考文献

Berger, P. and B. Berger. (1976). *Sociolog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Middlesex: Penguin.

Berger, P. and T.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Blaug, Mark. (1980).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ettke, Peter. (1987). “Virginia Political Economy: A View from Vienna.” *Market Process*.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5, 2: 7-15.

———. (1994). “Ludwig Lachmann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cience”. Peter Boettke, Israel M. Kirzner and Mario J. Rizzo, eds.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Vol. 1, 229-256.

Brouwer, Maria T. (2000). “Weber, Schumpeter and Knight 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8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J.A. Schumpeter Society. Manchester, UK, June 28 July 1.

⁵³ 门格尔不赞成庞巴维克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李嘉图主义方法，并评论说他犯了在利息理论中犯过的最大错误。

⁵⁴ 根据 Gunning (1997)，负责发展主观主义的其他经济学家是 J.B. 克拉克, P. H. 威克斯蒂德和 H. J. 达文波特。我因为 F. A. 费特对主观主义时间偏好的贡献而将他列入名单。

Buchanan, James. (1968). "Knight, Frank H."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Vol. 7, 424-428.

Emmett, Ross. B. (Spring 1999). "The Economist and the Entrepreneur: Modernist Impulses in Frank H. Knight's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29-52.

———. (2001). *The Chicago Tradition in Economics, 1892-1945*. London: Routledge, 8 volume set.

———. (2001a). Frank H. Knigh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ww.econlib.org/library/Knight/KnightBib.html#/reference. August.

Foss, Nicolai J. (Spring 1996). "The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Knight And Coase, and the Modern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8: 76-95.

Friedman, Milton.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nce, R.A. (1970). "Frank H. Knight o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Scope and The Economics of Frank H. Knight: An Austrian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Economic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8, 4: 547-558.

Granovetter, M.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3-11.

Gunning, E (March 1993). "Entrepreneurists and Firmists: Knight vs. the Modern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5: 31-53.

———. (1997).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ustrian Economics." W. Keizer, et al., eds. *Austrians 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the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519-30 9 Reprinted in F. A. Hayek. (1947).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77-91.

Hebert, Robert E (1985). "Was Richard Cantillon an Austrian Economist?"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VII, 2: 269-280.

——— and Albert N. Link. (1982). *The Entrepreneur: Mainstream Views and Radical Critiques*. New York: Praeger.

Herbenber, Jeffrey. (2001). "Human Action: What the Archives Tell Us." www.mises.org/downloaded on 20 August.

High, Jack (1982) "Alertness and Judgement: Comment on Kirzner." Isreal M. Kirzner, ed. *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ur of Ludwig von Mises*.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161-168.

———. (1990). *Maximizing, Action and Market Adjustment*. Philadelphia.

Kirzner, Isreal M. (1960).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9).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Creativity and/or Alertnes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1, 1-2: 5-17.

Knight, Frank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1935/1951).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y.

———. (1940).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VIII, 1. Reprinted in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s of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51-178.

———. (1947). *Freedom and Reform*.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 (1956).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s of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ppl, Roger. (1994). "Lachmann on Schutz and Shackle."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1: 289-301.

———. (1997). "Mises and Schutz on Ideal Types." *Cultural Dynamics*, 9, 1: 63-76.

Lachmann, L.M. (November 1947). "Review: Knight, F.H. *Freedom and Reform*." *Economica*, 314-317.

———. (November 1951). "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 *Economica*, 412-427. Reprinted in Walter Grinder, ed. *Capital Expectation and the Market Process*. Menlo Park, CA: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1977), 94-111.

———. (1970). *The Legacy of Max Weber*. London: Heineman.

———. (1994). Don Lavoie, ed.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 London: Routledge.

Langlois, Richard N. (1986). "Coherence and Flexibility: Social Institutions in a World of Radical Uncertainty." I.M. Kirzner, ed. *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71-191.

——— and Metin M. Cosgel. (July 1993). "Frank Knight on Risk, Uncertainty, and the Firm: A New Interpretation." *Economic Inquiry*, XXXI: 456-465.

Lavoie, Don. (1994). "The Interpretive tur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54-62.

Madison, G.B. (1988). "Hermeneutical Integrity: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Market Process*.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6,1: 2-8.

———. (1994). "Phenomenology and Economics." Peter J. Boettke,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38-47.

McKenzie, Richard B. (July 1980). "The Neoclassicalists vs. the Austrians: A Partial Reconciliation of Competing World View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 1:1-13.

McKinney, J. (1977). "Frank H. Knight on Uncertainty and Rational Act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3: 1438-1452 9

Mises, L.V. (1949/1966).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3rd edition.

———. (1962). "Profit and Loss." *Planning for Freedom*.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12-150.

O'Driscoll, G.E Jr. and M.J. Rizzo. (1985).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lackwell.

Pagu617é, K. H. (1985). "How far is Vienna from Chicago? An Essay on the Methodology of Two Schools of Dogmatic Liberalism" *Kyklos*, 38: 412-434 9

Prychitko, David. (1994). "Ludwig Lachmann and the Interpretative Turn i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Israel M. Kirzner and Mario J. Rizzo eds.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Vol. 1, 303-319.

Rothbard, Murray N. (1962/1993). *Man, Economy and State*.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1976). “Praxeology: The Methodology of Austrian Economics.” Edwin G.Dolan, 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City: Sheed & Ward, Inc, 19-39.

Savage, L. J. (1954/1972).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Dover.

Schweitzer, Arthur. (1975). “Frank Knight's Social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7, 3: 279-292.

Schutz, A.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ber, Max. (1947/1964).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ieser, Friedrich von. (1914/1967). *Social Economics*. New York: A.M. Kelly.

Yu, Tony Fu-Lai. (June 1999). “Toward a Praxeological Theory of the Firm.”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2,1: 25-41.